

黄达

文集
三
续
(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ollected Works of Huang Da

黄达

文集
三
续
(下)

Collected Works of Huang D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达文集：三续/黄达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300-18128-8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财政金融-文集 IV. ①F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5177 号

黄达文集 (三续)

Huangda Wen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7.25 插页 5	定 价	79.00 元 (上下册)
字 数	444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下 册

第三部分 任副校长、校长期间几个重要事件的专题整理

3-1 办学方向——定位于“普通”大学的曲折历程·····	247
3-2 “归属”的波折·····	269
3-3 从筹建“两院”到筹建国家行政学院·····	281
3-4 所谓“一派掌权”·····	304
3-5 与部门合作建院·····	308
3-6 中国人民大学“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公案·····	316
3-7 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始末（1985—1995 年）·····	333

第四部分 题词及其他

4-1 写在《现代名目论货币学说及其先驱者》扉页上的 一首打油诗·····	403
4-2 为张亦春教授从教五十周年题词·····	405
4-3 忆道口往昔岁月——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达·····	407
4-4 2012 年元旦贺洪葭管学长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412
4-5 为白钦先教授获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一届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题词·····	414



- 4-6 为林继肯教授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题词…………… 415
- 4-7 在陕北公学旧址修复和中国人民大学
培训基地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416
- 4-8 为曾康霖教授获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题词…………… 419

第三部分

任副校长、校长期间 几个重要事件的专题整理



2005—
2006



3-1

办学方向

——定位于“普通”大学的曲折历程

1 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学科设置上有其特点，但就其作为“大学”的性质来说，与我国的清华、北大、师大、复旦、南开、交大等大学一样，与外国绝大多数大学也一样，都是性质完全相同的“大学”——对之，在中国人民大学里面，曾名之为“正规大学”、“普通大学”。这样的定性，在今天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还要人论证中国人民大学是不是“正规大学”、“普通大学”，那会使人有点莫名其妙。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确实是关系学校命运的大事，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历程。

（一）正规大学的成立及其完成招收革命干部的过渡

2 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是 1949 年底；正式开始运作是 1950 年秋季学期。开始时，对于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大学”的性质，并没有成为问题。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① 里是这样说的：“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据说，对于“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

^① 这样的符号是说明我所保管的文档，它们已随整理的文字同时上交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



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十一次
政務會議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全面的徹底的勝利，新國家的偉大建設工作已經開始。為適應國家建設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設立中國人民大學，接受朝鮮先進的建設經驗，並聘請蘇聯教授，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新國家的各種建設幹部。人民大學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領導，在大學內設本科及專修班。大學本科暫設：（一）經濟系，（二）經濟計劃系，（三）財政信用借貸系，（四）貿易系，（五）合作財系，（六）工廠管理系，（七）法律系與（八）外交系，學習期限為二年至四年，專修班暫設：（一）經濟計劃，（二）財政信用借貸，（三）貿易，（四）合作財，（五）工廠管理，（六）統計，（七）外交，（八）教育，（九）法律等班，學習期限暫定六個月。該校設校方針，應是教學與實際聯繫，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該校定於一九五〇年二月開學。

部”的任务，曾有意放到北京大学组织实现，但最终的决策是就原有解放区大学的基础，独立组建大学。

对于这个新组建的大学与“旧大学（解放前原有的大学）”的区别，当时的着眼点是意识形态，是政治。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讲了这个问题【2】。他指出的区别在于“过去的旧大学……是按照西欧英、美、法、日办大学的方法办我们的大学。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的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他们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的大学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后来不久，郭沫若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他第一个给中国人民大学“定了性”，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新型的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其他的大学还需要经历改造等等。



至于就小学、中学、大学这个世界通行的教育层次讲，除了意识形态，当时人们并没有论证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大学”与其他的“旧大学”有什么区别。以下的两个说法可以印证：

当时有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亲手举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这里强调的“正规”，是相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大学而言的。从抗日战争起，在根据地有华北联合大学；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北方大学、中原大学；后来有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的华北大学。这些大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短期培训，把青年学生引上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短期培训的“革命”大学完成了历史任务，于是共产党要办“正规”大学了。实际上，在人们的观念中，正规大学就是在中国土地上，按照西方的样板已经办了几十年的那种大学——当然，就当时来说，要强调在“政治上”有原则的不同。

同时，还有一个同样流行的提法，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苏联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大学。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模式，从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学科建设、教师培养，直到工作中的会议制度和使用的各种表格，都是全部照搬苏联大学的。而苏联的大学，不论怎样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实质都是世界通行的大学框架。也就是说，当时从上到下的想法，办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办一所世界通行概念的大学；只不过它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苏联模式的……

3 后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大学的特点时，人们往往论断成“培养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其实，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

的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成立的十几年（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与其他所有的大学不同，作为学校主干的本科，招收的对象主要是，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说法，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或者说，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干部；也招收应届高中生，不过比例极小。当时，还设有一年制的“干部专修班”，是专收专业对口的在职干部。

当解放军在全国胜利进军之际，旧的国家机器同时被粉碎。此时，中国共产党接管全国政权所依靠的是在农村包围城市中所形成的一支属于“自己”的军政干部。他们是新的国家机器的骨干，但缺乏建设的专业知识。他们中间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自然而然地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以培养新国家各种建设干部为使命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首选招生对象。为了加快



培养进程，本科学制最初一两届曾定为三年。

到60年代初，对于随共产党“进城”的革命干部的培养任务已经完成——进城时的青年已经变成中年，不适于进大学学习。1962年开始，本科新生已经主要是招收应届高中生。“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招收了4届高中生。“干部专修班”的招生人数，从50年代中期逐步减少；1958年“大跃进”期间有所回升；进入60年代，进一步缩减。

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阶段来看，招收“干部”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过渡性任务；随着这一过渡任务的完成，与其他大学一样，中国人民大学的招收对象也是高中毕业生。此外，就是在招收革命干部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组织一直是按苏联大学的框架——实质也就是世界通行的大学框架——实施，而不是有一套培养“干部”的特殊框架。只不过是针对当时“干部”学生的特点，如文化水平偏低等，作适当的调节。正因为如此，在1962年转为全部招收高中生的过程中，学校的运作顺理成章，毫无震动之感。

（二）失落感和“教研生产力”

4 然而，5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有些同志中间弥散着一种失落感。

中国人民大学在最初创办的几年，地位是极其显赫的。当时，北京几个大学的排序是“人、北、清、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54年，教育部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座谈会，好像办大学就要以中国人民大学马首是瞻。可是并没有过多久，情况逐渐发生显然的变化。

——原来，好像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是“社会主义”的大学，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其他大学，经过了好几年的改造，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了。大家都是“社会主义”的了，中国人民大学也就失去了特殊的光环，保留下来的只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的革命历史传统了。

——在强调“一边倒”、学苏联的时候，经济学科和政治理论的教材都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中转，并传播到全国高校。后来，渠道日渐分散，不仅原来就不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理工科教材，就是社会科学的教材也不再由中国人民大学垄断。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人民大学在学



苏联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

——50年代初，在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的背景下，社会科学极受重视，但好景不长，理工科的发展逐渐摆在首位。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自上而下散播着一种观念，好像社会科学无须经过大学培育就可掌握。就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来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教育部所确定的在校学生规模已不到三千人，而50年代的在校生曾达到七八千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于北京的几所大学则有了这样的顺口溜：“师大穷，人大老，清华、北大谁也比不了。”

5 但是，在有这种失落感的同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骨干中间，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中国人民大学在不依靠特殊照顾，甚至在社会科学被轻视的氛围中，完全可以坚持、发展，并在中国的大学领域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这样的信念，在当时，也许还有些朦胧、模糊，不那么明朗，也没有强烈的表现，但的确是不会因风吹草动而发生动摇的信念。

这种信念的基础在于，在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十几年，已经形成了对于社会科学进行教学与研究的学术队伍，或者叫做“教研生产力”，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科、经济学科及其所属的主要领域以及法律、新闻和文史部分学科。到“文化大革命”前，也就是逐步失去了中国人民大学特殊光环的条件之下，这支学术队伍在这些学术领域中，已经凭借着真实的学术水平，取得了社会的、同行的公认，站稳了阵地。其中，不少教师已成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如果估计到建校之初的情况，仅仅经过十几年，在学术和高等教育领域就形成了站稳脚跟的“生产力”，也可称为“奇迹”。当时承担教研任务的队伍主要是三部分：①主要部分是具备相当于大学文化素养但没有经过专门学科训练的知识青年；②一部分青年工农干部（最初人数较多，后来大部分离开教研岗位）；③为数不多的旧大学的教授、讲师、助教（由于政治原因，他们潜力的发挥受到相当的限制）。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1950年秋开学之际，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一声令下，就冲上讲台，把刚刚听来的苏联教授讲授的专业学科内容讲给中国学生。上课前没有时间消化，下课后再消化；没有消化完，又要开始听苏联教授讲授下一堂课。时间不够，只有加夜班，放弃休息日。就是这样超高强度地向学术持续冲刺了几年、十几年，终于取得了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形成了学术的团队生产力。在今天，这是完全不可想



象的，但那时是特殊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应该承认，最初几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优势和学苏联的“垄断”地位，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员工也提供了其他院校不具备的优越条件。

特殊的优越地位是被“赋予”的。当特殊的支持逐步撤掉之后，特殊的地位就会逐步淡化乃至消失。剩下来的，那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实力。在“大学”领域之中，实力就是具有必要规模、必要学术水平的学术队伍以及相应的教学行政和后勤队伍。概言之，就是“教研生产力”，核心则是学术实力。也正是自己有了实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里才凝聚了不可动摇的信念。

6 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认为自己有了实力，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60年代初“七千人大会”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年间，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骨干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发表了许多学术著述。这需要单独加以总结。

1978-6-20 教育部

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 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和确定成仿吾、郭影秋同志负责这项工作的指示，经与成仿吾、郭影秋同志研究，并征得国家计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市同意，现就有关问题请示报告如下：

一、我们一致拥护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是建国初期以老解放区的原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建的一所文科大学，一九六三年经中央批准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至文化大革命前，该校已建设成为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一九七一年该校被撤销以后，使得这些方面人才的培养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教育部 1978 年《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3】中有这样一段话最为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九六三年经中央批准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至‘文化大革命’前，该校已建成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

这一段概括说明，在 60 年代初，教育部已经不再强调中国人民大学的特殊性，并把中国人民大学看作一个“普通”的、与其他大学同样的大学；只是在学科分工上与其他大学有别——具有文科的特点，且“水平较高”，从而列为“全国重点”。

（三）复校初期的摇摆

7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进程。在毛主席“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大背景下，不属于“理工科”的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了：校舍划归第二炮兵司令部，人员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后来，采纳了郭影秋同志（1967 年到校，辅助吴玉章吴老，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建议^①，以系的建制为单位，分几块划归北大、北师大、北京师院、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许多老同志出于对陕公—联大—中国人民大学这个革命教育传统和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的深厚情感，纷纷呼吁恢复中国人民大学。1978 年 6 月 20 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国务院以国发〔1978〕129 号文件批转【3】，同意恢复中国人民大学。

上面确定，成仿吾和郭影秋两位同志主持恢复工作。成仿吾成老的年事已高，郭影秋同志则重病在身。实际操作复校工作的是：①由成老聘请来的陕公老同志孙立宇、郝遇吾、劭子言；②原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张腾霄、胡凌昀、李震中等。主持工作的是孙立宇。

陕公的老同志，也包括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不少老同志，一心一意想恢

^① 郭影秋同志懂得学术团队和“教研生产力”的意义。这个建议是在当时形势下保护有生学术力量的最优选择。



复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时的“往日辉煌”，企图抓住的主要矛盾是办学方向，似乎明确了不同于其他高校的特殊办学方向，就有可能得到领导，乃至中央的特殊眷顾，取得重新崛起的新机遇。

孙立宇同志曾组织大量人力赴全国开展调查，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在我的记忆中，这些调查报告并未在校内传达。就我的印象，这次调查得出的倾向性看法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在于“培养干部”。在大学教育的框架内培养“干部”，中国人民大学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从6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培养对象已经发生变化。此时，已经没有了“进城的革命干部”，再要强调“培养干部”，那就是对“在职干部”的再培训，这是可由各种干部培训形式（如“专修科”等形式）完成的任务。要害的问题是，不能明确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在社科领域所形成的学术优势和教学优势是实质性的优势所在，从而不能把培育这样的优势作为首要任务，那就会关注了并非真正的优势而忽视全力培育真正优势的危險。当时，一些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骨干对这样的思路甚为担心。

8 这种思路的集中表现是1982年2月11日，教育部的领导听取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同志的汇报。汇报的底稿不知是否存档。

在教育部的《部长办公会议纪要》【4】中是这样记载的：“会议……原则上同意人大党委对学校办学方向、任务、办学形式和发展规模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应该认真总结培养干部的经验，使文科的改革同干部制度的改革衔接起来。……（一）从中国人民大学办学传统和任务出发，招生对象要相应调整。责成高教一司、学生司会同人大就培养县以下基层干部，提出方案（包括专业名称、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

基本原则，努力把人大办成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应该认真总结培养干部的经验，使文科的改革同干部制度的改革衔接起来，成为我国培养马列主义理论队伍、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高校政治课师资的阵地。

——会议决定——

（一）从人民大学的办学传统和任务出发，招生对象要相应调整。责成高教一司、学生司会同人大就培养县以下基层干部，提出具体方案（包括专业名称、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报部审定。争取今年就着手办，如实在来不及，可从1983年招生时实施。

教育部：《部长办公会议纪要》，1982-02-11，复印件，第二页的一部分。



很清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汇报和教育部领导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定位，应是“招收干部”的独具特色的“大学”。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的取向并没有付诸实施。

也应指出，《纪要》中也有“努力把人大办成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中心”的提法。但是，要就“培养县以下基层干部”全面设计一套与一般大学不同的“专业名称、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等”，那就会使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建设被排除在全国大学学术建设的主流之外。如果是这样，如何能够“把人大办成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中心”？

（四）统一正确的思路

9 “中发 41 号文件”是推动中国人民大学深入思考的触媒。

1982 年（几月？），在学校的中层以上骨干中传达了“中发 4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文件提出：“为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需要建立一所到几所正规化的中央行政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业务、文化水平的国家管理人才。请教育部对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开办中央行政管理学院的设想，进行研究，提出方案，报告中央。”^①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开办中央行政管理学院”！不仅是我，包括学校主要的领导以及骨干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在内，都觉得极为突然。

传达的当时，在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中，有少数同志出于对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之初曾经有过的优势地位已经消失殆尽的遗憾，认为这应该是中国人民大学重建优势的机会，从而为之欢欣鼓舞；有人还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应该摆脱对中国人民大学不能予以特殊重视的教育部而划归中组部领导。有的同志，从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和特点是招收并培养干部这样的认识出发，也赞成“文件”的定位。但大多数同志则警觉起来：认为这样的具体决策存在许多值得推敲之处。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开办中央行政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标志着革命教育传统的名号是不是就这么轻率地丢弃了？

——中国人民大学是从“学苏联”开始，学的是如何办“正规”大学。

^① 转引自【5】。